

社会学名家讲坛

LECTURE SERIES OF EMINENT SOCIOLOGISTS

包智明 主编

- | | |
|-----|---------------------------|
| 杨善华 | 农村调查的得与思 |
| 潘允康 | 论婚姻的社会性 |
| 高丙中 | 海外民族志与世界性社会 |
| 蔡 禾 | 利益诉求与创新社会管理 |
| 邱泽奇 | 中国人为谁而奋斗 |
| 郭于华 | 世界工厂的“中国特色” |
| 关信平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路径及当前的主要议题 |
| 郭志刚 | 中国的低生育率与老龄化 |
| 景 军 | 社会理论在全球健康研究中的运用 |
| 张庆燮 | “压缩现代性”视野下的韩国社会 |

社會學名家讲坛

第三辑

包智明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名家讲坛(第三辑)/包智明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161 - 5462 - 5

I. ①社… II. ①包… III. ①社会学—文集 IV. ①C9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804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35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社会学名家讲坛》是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系列讲座之一。该系列讲座始于四年前。2010年，为纪念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中央民族大学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其中之一就是举办了《社会学名家讲坛》纪念讲座。从2010年的3月至6月，我们邀请到十位国内外著名的社会学家来中央民族大学做学术讲座，这既是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也希望我校广大师生可以借机领略社会学名家的风采并分享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纪念讲座开始之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仅场场爆满，大受本校师生欢迎，而且来听讲座的还有不少从外校甚至从外地慕名而来的学子。一场讲座刚结束，就有很多人开始打听下一场讲座的时间。可以说，我们举办的这个纪念讲座获得了圆满成功。

十场纪念讲座结束之后，很多老师和学生来找我，希望能继续听到名家的讲座。为了满足广大师生的要求，我们决定把《社会学名家讲坛》的讲座继续办下去。这样，原本为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举办的纪念讲座，就变成了中央民族大学的常规性系列讲座。几年下来，我们发现，《社会学名家讲坛》系列讲座的效果明显，不但使听讲座的师生开阔了学术视野，而且也极大地提升了社会学学科的认知度。不仅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坚定了学习和研究社会

学的信念，还有不少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受讲座感染，决定报考社会学专业研究生或要求转专业到社会学专业学习，社会学成了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个热门专业。

中央民族大学的社会学专业还很年轻，但自 2001 年建立以来，发展迅猛，引人瞩目。这离不开包括《社会学名家讲坛》各位主讲人在内的社会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也获益于老一代社会学家立下的深厚学术根基。众所周知，社会学曾经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优势学科。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央民族学院借高等教育调整之机，汇集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全国一流人才，其中包括吴文藻、潘光旦、吴泽霖、杨成志、费孝通、林耀华、陈永龄、宋蜀华等国际级大师，完成了中国民族识别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调查等大型研究，为今天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学科发展奠定了综合多学科涵养、关注民族地区现实社会问题的学术传统。20 世纪 70 年代末，社会学在中国重建之时，中央民族大学虽没有建立社会学专业，但老一代社会学家依然进行了社会学、人类学，尤其是民族社会学等相关内容的教学和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并在社会学恢复阶段的人才培养和学科体系建设工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长于老一代社会学家培育的学术沃土，又有学界同仁的关爱支持，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学科才能在发展道路上不断迈出坚实的步伐，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中央民族大学于 2001 年开始招收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2003 年开始招收民族社会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2005 年获得社会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2011 年获得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2012 年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专业在中国本科专业排名中进入前六名，社会学一级学科评估进入前十名；2014 年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一级学科被评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同年获批设立社会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中央民族大学的社会学学科有其研究方向的特色，即把社会学

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应用到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研究之中，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做好国家民族工作献计献策。进入 21 世纪后，国内面临改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建设和谐民族大家庭等议题。在国际和地区关系中，民族因素的影响作用也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因此，中央民族大学的社会学研究团队将从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出发，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步伐的有利时机，紧紧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及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大局，充分发挥民族学科的资源优势，进一步提升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学科的特色与综合实力，构筑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基地，争取迈入国内乃至国际相关学科领域的先进行列。

如果说中央民族大学的社会学学科在研究方向上体现了自己的特色，那么在教学方面我们更注重体现社会学学科的共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修课程设置尤其力求与国内主流大学相同并与国际接轨。因此，主要面向社会学专业学生且与其教学相结合的《社会学名家讲坛》系列讲座，其主讲人不局限于从事民族研究的社会学家，演讲内容也涵盖了社会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也包括归属社会学一级学科的人类学、人口学和民俗学的研究领域）。

应邀在《社会学名家讲坛》做讲座的主讲人都是国内外社会学界的著名学者，能够第一时间在现场聆听这些名师专家最新研究成果的人是幸运的。我们希望没有条件在现场听讲座的学子也能够共享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此，我们征得各位主讲人的同意之后，决定把讲座录音整理成文字编辑出版。作为系列丛书，我们将按照系列讲座的先后顺序每十讲编辑成一辑陆续出版。收录于第三辑的即为系列讲座的第 21 讲至第 30 讲。《社会学名家讲坛》系列讲座的先后顺序完全是根据主讲人的时间方便来确定的，与其知名度和学术地位无关。

最后，借《社会学名家讲坛》第三辑出版之机，我向收录于第三辑讲座的各位主讲人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同时我也对参与第三辑

讲座的主持、现场翻译、录音整理、编辑、校对工作的中央民族大学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责任编辑、责任校对表示衷心感谢。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袁剑博士为《社会学名家讲坛》系列丛书出版所做的一切。

在提笔写此前言之际，惊悉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不幸逝世的噩耗。郑先生是《社会学名家讲坛》系列讲座第一讲的主讲人。以郑先生开头的这个系列讲座延续到了今天，他为系列讲座的启动和举办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谨以此书深切怀念郑杭生先生对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学科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以及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包智明

2014年11月11日

目 录

(按讲座时间先后排序)

第一讲	农村调查的得与思	杨善华 (1)
第二讲	论婚姻的社会性	潘允康 (30)
第三讲	海外民族志与世界性社会	高丙中 (52)
第四讲	利益诉求与创新社会管理	蔡 禾 (62)
第五讲	中国人为谁而奋斗	邱泽奇 (103)
第六讲	世界工厂的“中国特色”	郭于华 (133)
第七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路径及 当前的主要议题	关信平 (149)
第八讲	中国的低生育率与老龄化	郭志刚 (166)
第九讲	社会理论在全球健康研究中的运用	景 军 (201)
第十讲	“压缩现代性”视野下的韩国社会	[韩] 张庆燮 (225)

第一讲

农村调查的得与思^{*}

杨善华

感谢包老师邀请我到这里来做一个讲座。我是头一次踏进民族大学的校门：以前都是在外边，车来车去地经过那么多回。所以，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进来。因为做社会学的研究，兴趣非常重要。这就是，你一定要有好奇心。好奇心就是，总是要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有哪些东西你还不了解。所以今天我进来，也等于是在做一个调查。我的第一感觉是，原来从魏公村地铁口走到民大大门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这是在车上无法体会的！必须进来走这一段路才能了解！进校后要找文华楼，这一段路也不算短。所以这样一个过程使得我对民族大学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今天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有一个互动，我想，通过这个互动，可以使我对我们这个学院的老师和同学有个深刻的了解。

今天要讲的题目“农村调查的得与思”来源于我在农村的社会调查。从我最早接触农村调查，到把农村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领域，这隔了十多年。我最早进入农村调查，是跟着费老去四访江村。那是1981年12月，我们在江村住了一个月。那一个月收获很大，觉

^{*} 主讲人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人为朴光星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该讲座时间为2013年3月22日19：00—21：00。该讲座为系列讲座第二十一讲，由曾祥明录音整理。

得对这个村子的了解比以前深刻了！2005年再去江村时，江村已完全变样了。我只能找到以前的大队部，因为曾在那里工作过。邻居的房子全部看不到了。好在江村有个纪念费先生江村调查的纪念馆。我在那看到了自己的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是合影，另一张是我正在向费老汇报的照片，那是刚去江村的时候，我在向费老汇报家庭调查的情况。看到这两张照片，我觉得很亲切，也非常感慨——一晃这么多年就过去了。

下面先讲收获，因为题目是得与思。

一 方法论问题

第一方面的收获是方法论。方法论的收获首先在视角问题，涉及怎样去做农村调查。

（一）三种视角

做农村调查现在有三个视角：政府官员的视角、学者的视角和农民的视角。

2003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村干部直选。因为1999年实行村委会主任海选，我们对选举做了很多调查，发现出入很大。很多学者为此鼓掌欢呼，甚至把这个事情提到了“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的高度。大家都知道，第一次农村包围城市是毛主席当年解放全中国；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学者认为农村村干部直选可以称为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但是，这个观点我们不敢认同，原因是：我们的调查表明，某些农民只不过是借用选举这种形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2000年的时候，我们去广东东莞的一个村庄了解1999年的选举情况。这个村子最大的姓氏是谭，是个单姓村。单姓村也有家族问题，姓下面有房，由5个儿子传下来的，房和房之间是有矛盾的。

书记姓陈，他在 70 年代末期就当上党支部书记了。东莞市在 2000 年的时候已经富有得不得了了。

当时因为要直选，但这个书记想控制村委会，所以他要想办法来应付这个事情。当时镇党委书记跟他讲：你不能参与这个选举。他保证说：我绝对不会参与这个事情，但是如果群众要选我，那也没有办法。他留了一个后手。

回来之后他就开始召开谭氏家族的长老会，给他们许诺说：假如都选我，我给你们的孩子解决就业问题，然后提高你们的福利待遇。当时的东莞因为出租厂房，村集体是非常有钱的。我们了解到，在当地一个村子里如果有村籍，不管是 80 岁的老人，还是刚出生的孩子，一年就有 7000 块钱。这是白拿的，其中 5000 是生产队给的，还有将近 2000 是大队/村里给的。除了这个还可以在村里就业。他这样一讲，长老回去就开始动员。

村书记也有反对派，就是他们村的副书记，他也开始拉选票。我们访问过这个副书记，很多情况就是他跟我们讲的。村里有 2000 人，1500 人参加了选举，最后的选举结果是书记得了 900 票，副书记得了 600 票，所以副书记就没有当选。他们很气愤，所以就跑到上面去告，说这个选举不合法，说这个书记贿选。他们去告的时候，镇里根本不理，到市里去也不理，到广东省还是不理。最后，他们就到北京来告。他们集资了一百多万，到北京来告状，结果被一个骗子给骗了。

为什么要有这三个视角？从这个视角来看，就会发现农民对问题的看法和学者不一样，和政府官员的看法不一样。政府认为提供的资源这么好，但是为什么不用呢？要想想农民为什么不用，我们要去思考的恰恰是这个问题。这样就涉及怎样去理解农民，需要从农民的视角去理解农民的想法。下面我要讲一件我印象极其深刻的事情。

（二）按照农民的想法来理解农民——思想符合实际

2007年我们在四川的Y县做调查。Y县地形虽然是丘陵，但是某些丘陵的山还是蛮高的，海拔有1000多米。那次在Y县的调查是钓鱼式的，什么是钓鱼式呢？就是没有目的，也没有约好人，就是顺着路走。有个村子十分的怪，从村子这头走到那头有八里地，我们走的是西边的那头。我们在西边的那头看到有山有路，就判定山上一定有人住，爬到山顶，大概有700多米，那个山还是挺陡的，到山上之后我穿的棉衣和里面的衬衫全部被汗浸透了。我们遇到了一个大概60岁的老汉，姓黄。我们叫他老黄，我们说想跟他聊聊天，他同意了。我们做农村调查一般是从生活史开始的，就是问他家里有几口人，以及孩子什么的，然后就问到养老的问题。他提到有一个老丈人要养，因为老丈人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他跟他老婆的妹夫一起养。他的老丈人今年80多岁了。我们问他怎么个养法， he 说是吃“转饭”，一个月轮一轮。怎样的一个轮法，他说“担挑”（老婆的妹夫）上山来，跟我把老丈人抬下去，到一个月的时候，再把老丈人抬上来。我当时就想，这个犯得上吗？因为我上山还没有挑东西人都累成这个样子了，他们一个月轮一回，出那么多的体力，根本就不值。当时我没敢问，一起去的有一个四川的朋友，是社科院的李东山老师，他听到我这个疑问就笑了。他说：假如60岁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半年轮一回；到了70岁了，他们肯定是3个月轮一回；到了80岁了，他们注定是要一个月轮一回的！我很感慨，这就是农民的理性，他们要维持公平。如果是半年轮一回，这个老丈人如果住了5个月死掉了，那不就便宜下家了吗？如果一个月轮一回，老丈人住了半个月死掉了，那么至多便宜了下家半个月。

这个事情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不能想当然地用我们的想法去想农民。在四川尤其是在Y县这个地方，解决温饱没有问题，但是

他们没有现金。我们认为要节省体力和时间，可是他们最不缺的就是体力和时间。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去理解这个行为就会明白了。

2002年我们去访问一个社长，他们还沿用集体时期的叫法，（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说他刚去山上处理了一个刑事案件，他是很严肃的。我们问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刑事案件，他说是偷盗，偷了一口锅，大概值20多块。我当时的想法是20块钱的案件在北京的哪个派出所能够立案？但他是一本正经地跟我讲的。因为这口锅被偷了之后，他买不起；锅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财产。这是我讲的方法论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案例，就是必须按照农民的想法去理解他，这样我们才可以使得我们的想法符合实际，不然的话，从脑袋里拍出来再多的东西那也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农民的想法。尤其是现在农村的分化那么严重。下面有几张图片给大家看看，这个房子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个村的党总支书记是某著名羽绒服品牌的老板，他当初接任的时候立下军令状，就是把全村所有的房子都翻盖成这种别墅式的，而且每一家都有车库，当然不一定有车。苏南和浙江有很大的不同，苏南农村是强政府弱社会，其特点就是政府有钱，但是村民不一定有钱。我带着学生在常熟做调查的时候，有一天吃早饭，我们走进一家非常普通的小饭馆，一碗爆鱼面（一碗面煮熟了加上一块熏鱼）当时在苏州大概是卖5块钱一碗，这个地方是3.5元，有1.5元的差价。常熟在全国百强县中当时是排第五，很富有。我们几个女同学喝粥，嘀咕说没有咸菜，老板听到了，就毫不犹豫地到厨房给她们端出来一碗雪里蕻，并跟她们讲这碗雪里蕻是免费的。我看到雪里蕻就想起当年在江村调查，2005年和1981年已经隔了24年了。24年之前我在江村看老百姓吃饭，雪里蕻是非常普遍的下饭的菜。24年过去了这个情况还没有改变。可能有两个原因：老百姓喜欢吃雪里蕻；老百姓没有钱去买别的东西，比如说买个咸鸭蛋。一个牌价的问题，它的背后就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东西。

2005年新农村是建起来了，当时我们问老百姓你们要住这样的房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入住法呢？老百姓跟我们讲这个房子建起来不算地皮是26万，村民要交11万，还有15万是村里来出。在这个羽绒服公司里面干的工人，2005年是1000多块钱一个月。如果两个人在那里干，就是两千多块钱，吃饭花掉一部分钱，孩子上学要花掉一部分钱，所以一年下来顶多只能剩下一万块钱，如果凑齐这11万也得10年多时间。房子是建起来了，很多村民也住进去了，但是去访问时发现他们中有的把八仙桌、长凳都搬进新房了，这说明他们已经没有余钱去置换新家具了。一般我们换新房都是要换新家具，按照这个常理，我们知道即便是这11万，对他们而言，负担也不轻。后来我给镇上的秘书写了一封信，提了几条建议作为回应，其中就讲到拉动内需，就是市场潜力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发展。

总之，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通常是需要一种洞察力，但是洞察力来自前面的周密准备，比如需要有常识，又比如说要去关心牌价，通过这个看生活水平。当我们有这种想法，把所有的现象联系起来考察的时候，这就涉及刚才讲的第三点，就是全局观的问题，或者说是我们通常讲的社会学的视野。

（三）全局观——社会学的视野

社会学的视野不是空的，它背后隐含的意思就是：当你在了解这个问题的時候，一定要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考察；当你把这些联系起来考察的时候，你会发现现象与现象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当你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把现象联系起来考察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第二点是一个补充，我要补充的是，等到我们开始调查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分析框架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国家与社会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或者是乡村基层政权与农民，我们研究农村问题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些现象放在这个框架里面来看。比如，2007年和

2008 年的时候开始减免农业税，我们正好在宁夏调查，我们就跟农民聊天，我们说现在减免农业税，你们的负担减轻了，那个村民就立马回应我说，但是农药和化肥涨价了。这说明了国家把钱放进农民的口袋，但是另一只手又从农民的口袋里把钱拿走了，所以农民是非常现实的，他们会看他们自己实际得到多少好处。

然后再讲第二个问题，就是乡村政权与农民的关系。我们从 2005 年开始就一直关注乡镇政权，我们感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以往我们对乡镇干部的看法有很多偏见，这些偏见来自很多方面，比如说媒体的宣传，一说乡镇干部就说是“身穿黄大衣，腰挎 BB 机，开口他妈的”，给人的感觉是乡镇干部就是痞子。可是当我们去的时候就感觉乡镇干部他们才是在第一线，他们的苦处也不是我们一般的老百姓或者在局外的人可以想象得到的，因为国家很多的事情都让他们做，他们跟我们讲，并用八个字概括了自己的处境，那就是“权力有限，责任无限”，为什么呢？因为国家为了防止乡镇政权和农民发生矛盾，包括减免农业税（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防止乡镇政权和农民发生冲突的一个措施，当时国家除了这个之外还把乡镇的很多权力上收了，改成垂直领导。比如派出所，派出所最初是乡党委有权提名所长，现在全部是由公安局提名、任命所长，然后县公安局负责乡派出所的经费，所以乡党委有什么事情要他办的时候，都需要跟乡派出所的所长商量，派出所所长可以拒绝。他们跟我们讲，现在有点钱和有点权的全部都变成了垂直领导，只有一个计生委，一个办公室，还有一个文教局，都是没有钱和没有权的，归他们管，但是他们的责任一点都没有减，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他们去做。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属地管理，就是假如你这里发生车祸，乡镇政权也是被问责的单位。大家还记得吗？就是 2011 年温州高铁出事，高铁出事后当地政权的救援是非常及时的，其实你们不知道，因为问责制度，就是因为属地管理，他们必须马上冲到现场，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

要被问责，就是要摘掉他们的乌纱帽，干部不怕别的，就怕被撸掉乌纱帽，所以这个是最要害的事情。所以乡镇干部确实有很多难处，但是现在问题是中央政府与乡镇基层政权之间的信任有些问题，比如在2004年中央给农民发放过一个种粮直接补贴，当时种粮的直接补贴是每亩地10块钱，但是这10块钱是不经过乡镇政府的，是通过农村信用社直接打到农民的账户上的，乡镇干部不是傻子——这明摆着就是信不过我们嘛，就怕我们雁过拔毛。我认为这对政令的畅通是有影响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国家、基层政权和村民的关系，这三者之间，村干部，乡干部和县级的地方政府，然后再往上走，你必须把很多现象放在这个里面来理解，你才能真正明白。

我要补充的是，我们要关心目前我们国家的体制问题，因为很多现象最后都可以归结于体制。首先我要讲一下我国的政治体制，我们国家现在的政治体制，又可以称为压力型体制，或者叫作目标责任制，是指现在的干部要考核，考核是用数字的，比如一个学院每一个老师要发表多少论文，是有具体规定的。目标责任制和问责制度对干部的晋升和罢免有直接的影响，这是干部的切身利益所在。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我们在河北Y县做调查，那里是革命老区，但是Y县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越级上访，那是因为他们离北京太近了，我们坐大巴26块钱就到那里了，所以对Y县的农民来说，去石家庄的成本还没有去北京的成本低，所以他们有事没事就往北京跑。大家知道2006、2007年的时候出了一个新的信访条例，这个条例把越级上访当作干部考核的重要指标，即一票否决，如果你的上访人数过线了，那你这一年就白干了。我们去Y县做调查的时候，Y县的县委副书记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因为河北离北京很近，所以中央对河北的越级上访要求很严，比如在十八大之前，那是严令不能出现越级上访的，所以乡镇负责维稳的干部每天上午要到长途汽车站查票，如果看到可疑的人，像是越级上访的，马上就会把他拉回去。县委副书记就跟我们讲了L县一个事件，是一起交通事故，一

辆大卡车撞了一辆摩托车，当时县公安局的交通大队已经判案了，大卡车负全责，说摩托车应该得到赔偿，就赔了 200 元。不过当时出了一个新规定，叫作市公安局长接待日，到这一天市公安局长都要到信访处接待上访。骑摩托车的那人非常有时间，当他听说有这样一个规定的时候，他就在那一天去找 B 市公安局长，讲了这件事情，公安局长当时没有表态，跟他说我要先了解一下情况。公安局长跟 L 县打电话，L 县那边说是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处理了。下一个接待日，这人又去了，B 市公安局长说这件事我们已经处理了，那人说我就是对这个处理不满意才来找你的。局长说人家不是已经赔了你 200 块钱了嘛，那人就说 200 块钱不够，局长说那不行，那人就说那我要到北京去上访，公安局长听他说要去上访，就对我们再商量一下，你先回去。下一个接待日他又去了，B 市局长说我们商量了，给你赔偿 800 块钱，他说 800 块钱哪里够，局长问那你想怎么样？这人说我要求赔偿一辆新车。其实他的摩托车也就是灯坏掉了。局长被这人缠不过，就跟 L 县打电话说你们赔他一辆新车吧。但是我们听到这个事情后，我的心里其实蛮苦涩的，我感觉“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个理念是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是在目标责任制这样一个体制下很容易被扭曲，我跟其他的老师和同学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刁民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仅仅是一个现象，如果把这样的一个现象放在这个体制下来思考，来理解，就会不太一样。比如我们来分析公安局长，他怕什么？他怕的就是越级上访，而村民抓住了这个软肋，用这个来要挟他，所以村民达到了这个目的。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很多，我个人建议大家，见到这些现象之后一定要去想，而且一定要跟我们这个社会现行的体制联系在一起，我对这个问题的感受是太深刻了。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财政体制。因为我们的财政是分灶吃饭体制，这意味着每一届政府只要有财政的就一定要自己解决自己的吃饭